

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巴干 赵智奎 陈红艳 编

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巴干 赵智奎 陈红艳 编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敦朴
封面设计：江燕红

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巴干 赵智奎 陈红艳编

•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1/8 字数：240千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月10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统一书号：2049·12 定价：2.15元

ISBN 7-105-00056-2/B·6

**献给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四十周年!**

继承民族文化
的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

乌兰夫

一九八四年十月

序

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多种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对于高等学校的哲学史教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多数中国哲学史著作，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无所论述或论述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几年来，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西藏等地的哲学史工作者，对于各地区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写出很多有价值的论文，弥补了过去哲学史工作的缺欠，这更是值得赞扬的。

哲学思想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国内各兄弟民族都有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少数民族的有关著作以及口头传说进行深入的探索，足以表明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丰富多采。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曾经涌现出不少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例如成吉思汗、忽必烈、萨囊彻辰、尹湛纳希等，他们各有其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也有些蒙古族学者，对于中原地区的古典著作进行过钻研探究，对中原的学术发展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例如保巴的《易原奥义》和《周易原旨》，倭仁的《为学大指》，这更足以表现汉族文化与兄弟民族文化交光互映的美好景象，更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志们研究蒙古族哲学思想史，卓有成就，最近，他们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献礼，编成这部《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非常高兴，于是将自己的一些感想写出来，聊以表示赞扬之意云尔。

张岱年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序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张岱年
继承蒙古族的优良传统开展哲学史的科学研究.....	石 峻
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陶克涛
蒙哲史研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兼论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中的重要意义.....	蒙和巴图
蒙古族早期宗教和无神论思想萌芽.....	乌兰察夫
论蒙古族古代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发生发展.....	满都夫
《蒙古秘史》的哲学思想.....	旭 江
《蒙古秘史》军事思想初探.....	赵智奎
成吉思汗兵法与时代特点.....	巴音图
试论成吉思汗朴素军事辩证法.....	达林太
《蒙古秘史》军事思想再探.....	赵智奎
孤儿的智慧 哲理的闪光	
——《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员大将》哲学思想初探	
.....	格·孟和
浅论蒙古族“长生天”思想产生及演变的根源.....	乌 恩
忽必烈“应天”“至诚”观及其体系简论.....	巴 干
论杨景贤的哲学思想.....	周双利 王 坤
“印、藏、蒙、汗统同源”论分析.....	巴 干
萨囊彻辰思想简论.....	乌兰察夫
萨囊彻辰汗权思想的历史地位.....	苏 和

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的自然哲学初探·····	包赛音
倭仁及其哲学思想·····	程作新
尹湛纳希思想简论·····	宝力格
从鸦片战争谈裕谦的爱国主义思想·····	陈红艳
从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反动活动看其哲学思想·····	新娜 陈红艳
“带有流动范畴”的哲学思想	
——试谈蒙古族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	丹波 巴特尔

继承蒙古族的优良传统开展 哲学史的科学研究

石 峻

一、蒙古族哲学史研究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蒙古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它早在秦汉以前就有文献记载，在我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并在世界历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西方古代数学的经典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最早就是用蒙古文翻译后传入我国的。我国的“四大发明”也是经蒙古族从元代开始传入西方并从而著称于世的。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详细地记载了元代中国社会的高度文明，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羡慕，促进了后来东西航线的开扩。在近、现代，蒙古族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一直起着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因此，继承蒙古民族的伟大传统，开展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对于建设我国各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

对于蒙古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国外，无论是西方或东方，都有着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关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弥补我们史料的不足，特别是关于元代的。当然对这

些著作要加以分析。我们应该放眼世界，与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并敢于纠正、批判外国有关著作的错误。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并从而使我国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研究，走在世界蒙古学研究的前列。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勇气。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特别是蒙古族同志的光荣责任，是可能也是应该大有作为的。

二、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是宽广的

哲学的范围，在古代是比较宽广的，从中国来说，同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等联系尤其密切。我们研究哲学史，是研究过去的哲学。如果按现在的分法把它搞得过细，对研究工作是不利的，也不大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要真正弄清楚当时的哲学思想，离开当时的社会思想，那将是十分抽象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哲学是一种高度的抽象，离开了当时实际的、具体的东西，那就很可能变为一种空洞的抽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加上社会思想史乃至科学史，把它们联系起来去理解，才能弄清过去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通常，科学和哲学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古代天文学、医学乃至军事学的著作，直接称为哲学的理论著作，但是通过或借助于这些著作，探索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却是必要的，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来进行考察，并从中作出哲学的理论概括。我们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宽广的。而且这方面的资料从现在看来是很多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仅限于从概念出发，从寻找什么是合乎现代哲学定义的著作出发，去进行所谓的理论研究。我们应该从客观事实和思想实际出发去从事解剖。

三、蒙古族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特点

蒙古民族是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必然要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不断地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当然会产生自己的哲学及社会思想。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例外的。当然，有的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有的有书本专门记载，有的则没有或记载不完整，或虽有记载后来却散失掉了。但这只能说是保存形式的不同而已，而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的问题，我们不能以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来确定一个民族有没有哲学思想。就拿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丘来说，他本人也没有写过专门的著作，《论语》一书，便是他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记录下来的他的言行，而且也不是专门讲哲学的。古代印度地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是现在的尼泊尔人）传说也没有写过什么书，但是现在所谓的佛教经典累计下来，有成千上万卷。我们不能因此说孔丘、释迦牟尼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值得研究。同样，从这个原则去看，蒙古民族也是有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

与此相联系，可知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就不必一定要以古代某一本哲学理论著作或文献记录为唯一对象，而是应该从广泛的各种思想资料出发，去进行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这应该是目前蒙古族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蒙、藏地区的社会调查，利用包括喇嘛教经卷等在内的各种资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撰写出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科学著作。

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培养精通古代蒙古文献的专家，以整理、发掘有关的

资料。在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还要注意我国和外国之间、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彼此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去搞。例如，佛教虽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是一经传入中国，就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而有所改造，成为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外来的东西和国内固有的东西，往往有从相互对立到融合乃至合统的情况。二者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可简单看待。同样，蒙古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应该说也有这种类似的联系与区别，不能只看到它们形式上的共同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它。

四、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

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就是思想性或革命性同科学性的统一问题。具体地说有三层含义：第一，要使我们的研究牢固地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和思想实际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任何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第二，研究方法本身要科学。在学术研究中要逐步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而不能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第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这种研究工作将会走上邪路，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具体联系我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就有关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我认为应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般人大都认为哲学是“文科”。这当然有一定原因，但是哲学的“文”不完全相同于纯文艺的那样一种“文”。文学艺术可以而且有必要搞浪漫主义，诗歌和戏剧尤其突出，但是哲学就不可以如此。因为唯物主义哲学是要搞实事求是的，不然就会导致宣扬唯心主义。涉及到中国哲学史，过去许多著名哲学家的“碑”、“传”，大多出自过去封建文人的手笔，并且前后相袭，只说好的不讲坏的，隐恶

扬善，“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因此对这些记载我们一定要分析、考证，不可以盲目相信那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不可以去模仿。对于哲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也要实事求是地去看，例如孟轲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果真那个时代社会上的“乱臣贼子”，就如此害怕别人议论吗？我总有点怀疑。此外，还有许多神话的东西，更不可以完全置信。我们一定要尊重事实，破除对古代书本中的记载以及有关传说的迷信。至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哲学家，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本不是什么“超人”，我们也不可以迷信。应该来一个思想上的解放。

第二个方面，要注意其他有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家都感到资料不够用，需要大力地整理、发掘，这是一种客观的要求，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标志。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将来即使我们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是否就一定做出重大的贡献呢？那也是在“两可之间”。如果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研究的方向不对头，也仍无济于事。弄不好有的人可能只成为活的“书柜子”，有的人甚至可能制造出一些更加精致的毒品来。因此，一定要很好地注意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万不能一味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而要敢于“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不能没有分析批判的头脑，分不清“精华”与“糟粕”，甚至把糟粕视为精华来加以宣扬。

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解放前后几十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为了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封建复古主义乃至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当前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是很必要的，既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

陶克涛

(一)

在对蒙古族的研究领域里，史事的阐述、古地的核实、典章的考释、名物的辨证、籍录的译校、社会的剖析、经济的检讨、族系的排比、语言的论列等等，至今一直是人们恻恻然勤于用力的所在。应当承认，随着日积月累，这种辛勤是创获既称丰硕，其有益于学科的繁荣，亦人所共知。这样的成果是需要继续努力扩大的。然而在瞻顾这种繁荣的同时，亦不能不使人想到：蒙古学中的一块不小的园地，至今似乎甚少为学人所注意，这就是蒙古哲学史。学术界迄今为止所作的很不完全的有关统计中，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竟无一篇关于它的论著。国际性的蒙古学学者会议，从1959年以来已开过三次，除最后一次有人就其国家的哲学发展作了报告外，也不再见有什么消息。因此，说蒙古哲学史至今尚属荒外之区，恐怕不为过吧！“荒外”就是冷僻。蒙古学各学科满堂兴致，独独使哲学史这样一门重要学科向隅，显然是一个缺陷。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我国，为改变这一状况而首先倡议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并将其列入整个学术规划的，是内蒙古的哲学界。多少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结合现实的与学术本身的需要，经过社会科学部门和学术界专业人员的努力，内蒙古社

会科学阵地，一扫“四人帮”时期独擅“帮”术、摧残百家那种则暗则喑的影响而展现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色。“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它不但积极地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总则，而且同时也为蒙古族哲学史的开拓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看到，内蒙古哲学界的同志们及时地利用这些条件并依据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建立起专业机构，调配了专业人员，勤勤恳恳地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几年来，他们经之营之，的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然，工作刚刚起步，路途还很遥远，眼前从事这一工作的力量也还嫌少，然而能有意识地提出这一课题本身就已具有首创意义，能起步就了不起。“朝发轫于苍梧兮，余夕至乎悬圃”，只要有了这个“发轫”，我想，经过艰苦努力，不用很久，登上那个哲学史“悬圃”的希望，终究会实现的。张协说：“大夫不遗，来萃荒外”，我的确希望学术界的“大夫”们，不遗于此，萃萃然来共同从事这一科目的研究，使蒙古族哲学史这一园地亦如蒙古史的其它各科那样，开花，结果。蒙古族哲学史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以为“没有油水”的论断是不妥当的。

(二)

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对于理解蒙古族历史具有肯定的意义。1834年，德国诗人海涅说：“法国人最近读了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以为能够理解德国了。然而他们借此只不过从完全无知的状态，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面。因为只要他们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仍是一些默默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哑谜。”^①蒙古的哲学史当然不能等同于德国的哲学史，甚至也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假如有人愿意遵照古书所谓“启乃心，沃朕心”的训示，从重视哲学史这个角度出发，把这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话，

加以引申而套用在蒙古民族身上，说只要不从哲学上理解蒙古史，或者说，只要不理解蒙古哲学史的意义，蒙古文学作品不过是无声的花朵，整个蒙古历史的思想依然是隔膜的，也许不是全无启沃的吧！蒙古哲学史的研究，对加深蒙古历史发展的了解大有裨益。马克思曾经提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但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④，这就需要调查研究产生这些原理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对于蒙古历史情况也需如此。在考察蒙古历史思想的演变时，除根本地从经济基础中去找原因外，还需要向思想本身去探溯，就是说，需要研究蒙古哲学史。从蒙古史的探讨中，人们不但有可能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蒙古人社会活动的思想渊源，从而了解到为什么有些历史经历取得了成功，而另外的活动却终告失败；而且也有可能使他们了解到某种哲学思想本身又是在什么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了解到蒙古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和与其他各民族思想的关联性。正是由于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才可能有助于把握蒙古民族意识与传统的形成和特点；也正是由于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才可能有助于去鉴别和扬弃历史上积累起来的那些理性的精神财富或糟粕。

赵紫阳总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指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作为祖国哲学史一部分的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正是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它有助于提高人民爱祖国、爱人民；有助于发展和繁荣优良的民族文化。

(三)

蒙古民族有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对这问题有人曾提出过怀疑。我以为对于这样的怀疑本身应当理解。蒙古这个民族虽然有较悠久的历史，也曾开放出自己的文化之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条件所加予它的贫困、屈辱，直到解放时为止，尚没有使它孕育出自己成熟的专业哲学家，没有哲学的讲坛，也没有系统的、专门的哲学经典，至少至今还未发现过这些方面的文字记录。当人们迫不及待地以这样的表象与别的先进民族相比时，发现蒙古民族并没有它的“亚里士多德”，它的“吕克昂”，它的《论灵魂》，也没有发现它有自己的程、朱学派、自己的“经学院”、自己的四书五经，因而持疑乃至不相信蒙古族有可资研究的哲学史，那或者是十分自然的，然而据我看，不妨从另外的或者说从哲学史本来的意义上去理解。什么是哲学史？

列宁曾经指出，哲学史“简单地 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③依据这一公式，说蒙古哲学史，简单地 说，就是蒙古人整个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事实上，蒙古人亦如任何别族的人一样，他们的历史活动也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也有意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也有认识过程的产生、发展；也有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认识的能动飞跃；也有特定时期的特定思潮对另一特定时期特定思潮的继承、演化的历史。怎么可以忽视这样的历史过程呢？不能设想，列宁的上述定义不适用于蒙古历史。

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蒙古族哲学史也是蒙古族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蒙古民族从进入阶级社会之时起，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就不断地进行争夺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为了战胜对方，各阶级在使用一切必要的政治、